

元明之际士大夫研究综述

展 龙

(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河南开封 475001)

自上世纪 80 年代始,士大夫研究日渐勃兴。其中,对春秋战国时期、秦汉之际、魏晋时期、唐宋变革时期、宋元之际、明清之际、晚清等社会变革时期士大夫群体的研究,更为学界所热衷,相关论著异彩纷呈。对于元明之际士大夫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仍显薄弱。以下,拟就笔者所及,对 20 世纪以来中外学界有关元明之际士大夫的研究予以鸟瞰式回顾。

一、对士大夫文学创作和成就的研究

就总体性研究而言,一些文学通史著作辟专章专节讨论了元明之际士大夫的文学创作、文学思想及成就等。如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年)和《明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 年)、顾建华《中国元代文学史》(人民出版社,1994 年)、袁震宇等《明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杨镰《元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年)、张德建《明代山人文学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年)等著作的部分内容对元明之际的主要作家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论述,创获颇多。与此同时,专题研究亦陆续展开,研究课题主要集中在浙东、吴中两地作家。

1. 对浙东作家的研究。王琦珍《论明初文坛的浙江文派》(《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3 年第 1 期)、欧阳光《论元代婺州文学集团的传承现象》(《文史》第 49 辑)两文勾勒了浙江作家的传承情况,并扼要分析了该文学集团形成的历史原因。此后,徐永明《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立足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对以黄潛、宋濂等婺州作家群的生平、构成及其诗文成就作了较全面的研究。全书在史料的挖掘,史实的梳理,理论的建构方面皆有建树。

除总体性研究外,学界还对元明之际的浙东文人进行了个案探究,研究对象以刘基、杨维禎(一作杨维禎)等人为主,内容涉及其诗歌、词赋、散文、寓言创作及文学思想、文学地位诸方面。如张秉政等《刘基寓言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年)对其寓言创作的思想内容等方面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陈文新《刘伯温:智略人生》(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 年)则重于诗文的赏析。吕立汉《刘基考论》(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 年)在考辨刘基文集的版本流传、诗文系年的基础上,着重对其诗文创作风格、艺术特色、文学思想、文学地位作了探讨。周群《刘基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是迄今为止研究刘基最见功力、最富思辨色彩的一部专著。是书虽以思想研究为主,但亦对刘基的文集版本、诗文创作、历史地位等作了考察。另外,研究以

杨维桢为代表的铁崖派的论著亦相继出现。最早,刘美华《杨维桢诗学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对杨维桢的诗歌创作、风格、理论及成就等作了论述。黄仁生《杨维桢与元末明初文学思潮》(东方出版中心,2005年)首次对杨维桢的思想心态和创作成就进行了深入探究。书中以杨维桢的文学创作活动与影响为中心线索,重新审视了整个元末明初文学思潮的发生、发展乃至消亡的过程及原因。同时,邓绍基、黄仁生、乔光辉、刘倩等还撰文对杨维桢的文学观、诗歌特点、戏剧序跋、铁崖诗派的形成及成员构成等作了考察。经过多年研究,元明之际浙东作家的概貌大体呈现,学界对浙东文学的价值也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

2. 对吴中作家的研究。近期,吴中作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相关研究既有宏观的审视,也有微观的考察。王忠阁《元末吴中诗派论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堪为这方面的力作,该书联系元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对以顾瑛、倪瓒、陈基、高启等为代表的吴中诗派的形成、创作活动、诗歌精神、文学风格、文学主张及历史地位进行了剖析。与此相应,陈建华《明初政治与吴中诗歌的感伤情调》(《复旦学报》1989年第1期)、廖可斌《论元末明初的吴中派》(《苏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王文田《元末吴中诗派的诗歌精神》(《信阳师院学报》1992年第1期)、汪渊之《高启诗与“吴中四才子”诗之比较》(《苏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等,亦专门对吴中作家的诗歌创作及风格进行了探讨。高启的诗歌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举凡其自适诗、怀古诗、乐府诗、纪游诗等创作,皆有一定程度的研究,如蔡茂雄《高青邱诗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李圣华《论高启由元入明的心态及诗歌创作》(《中州学刊》2005年第2期)、左东岭《高启之死与元明之际文学思潮的转折》(《文学评论》2006年3期)、曾庆雨《高启与明代诗歌》(《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诸文,挖掘了高启由元入明的心态及诗歌创作,总结了其人生经历、创作历程及与元明之际文学思潮转折间的关系。

3. 对闽中、江西作家的总体或个案考察。既有成果注重从政治和文学结合的角度来考察两个文学流派的诗文创作。如洪峻峰《明初“闽中诗派”诗论评说》(《福建论坛》1986年第2期)通过对以林鸿等为代表的闽中诗派诗学理论的辨析,指出明初闽中诗派的诗学理论,不仅在当时具有纠偏除弊的重大意义,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蔡一鹏《闽中诗派的诗歌创作与明初社会、文化背景》(《福建论坛》1990年第3期)和《论闽中诗派》(《文史哲》1991年第2期)阐述了闽中诗派在理论和创作上的基本特征,并对其兴起的社会背景与文化场域进行了辨析。王忠阁《关于明初闽中诗派的几个问题》(《河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和《闽中诗派与明代前期诗风的演变》(《河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考察了闽中诗派的成立时间、成员构成、创作活动、诗歌主张及与明初诗风演变的关系等。唐朝晖《江西文人群与明初诗文格局》(《学术研究》2005年第4期)以刘崧等为考察对象,认为江西文人典雅淳朴的诗风已成为明初文坛的主导风格,并深刻影响了明代文坛近百年的台阁体。王学文《以地域分野的明初诗歌派别论》(《文学遗产》1989年第5期)则将明初诗人分为吴、越、江右、闽、粤等五大创作群,进而以各派典型人物为考察对象,分析了各派的诗歌创作、风格及影响等。

以群体研究为基础,徐永明《元末明初南方两个文学群体成员的交往及其差异》(《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打破地域界限,对元末明初浙东、吴中两大作家群体的社会交往、生活方式、政治追求、文学创作中的差异及其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此外,有的学者还对以往关注较少的余阙、顾瑛、丁鹤年、马祖常、李孝光、戴良、迺贤、刘崧等人的文学成就进行了初步考察。

凡此,无疑推进了元明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二、对士大夫心态动向和学术思想的研究

1. 对士大夫心态动向的研究。近年来,心态史日渐成为一个专门的话语为学界所接受。元明之际,受特定时代影响,士大夫心态复杂多变,故为学界所注目。最早,钱穆在《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及《续编》中藉诗文以论史,通过对宋濂、刘基、高启、杨维祜、苏伯衡等人文集的细致审察,揭示了明初士大夫内心蕴意,勾勒出元明之际学术思想概况。此后,相关研究趋于细化、深化。如幺书仪《元代文人心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徐子方《挑战与抉择——元代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夏咸淳《情与理的碰撞——明代士林心史》(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等都设专章阐释了元明之际部分士大夫复杂多样的内心世界。其中,幺书首次从心态史的角度,在末章以危素、杨维祜等为考察对象,再现了元末文人的心灵轨迹。徐书则以史为经,以具有典型心态的文人为纬,对元末文人的心路历程进行了较为完整的梳理。夏书博采广撷,分初期因袭、中期突破、后期超越三个阶段,探讨了明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心理的律动。其中在初期因袭阶段,专门论述了元明之际学术的嬗变和明初士大夫的人格特征。除专著外,一些单篇论文也考察了其间士大夫的心态,所论大体集中在士大夫的政治态度和道德实践上,如劳延煊《元明之际诗中的评论》(载《陶希圣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食货出版社,1979年)、王晓骊《元末明初词人心态研究》(《中国韵文学刊》2002年第2期)、汪红亮《试论明初入仕元官的境遇与心态》(《江西师大学报》2005年第3期)、徐子方《从宋濂、刘基的早期诗文看其由元入明前后的心态》(《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王恩俊《明初隐士群体的政治取向与道德实践》(《青海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周松芳《论刘基的遗民心态》(《学术研究》2005年第4期)等,皆是如此。

2. 对士大夫学术思想的研究。总体上,有关元明之际士大夫学术思想的研究成果较为单调,考察的对象仍以刘基、宋濂等人为主。如刘基,上世纪60年代,容肇祖、王范之围绕其哲学思想展开了争论。容氏《刘基的哲学思想及其社会政治观点》(《哲学研究》1961年第3期)力主刘基哲学思想是朴素的唯物主义;王氏《刘基的唯心主义自然观》(《光明日报》1962年5月4日)、《刘基是朴素唯物主义者吗?》(《江海学刊》1963年第7期)则认为是唯心主义。双方各执己见,据理力争,使刘基思想研究向纵深发展。80年代以降,学界根据刘基所著《郁离子》、《犁眉公集》等,对其政治、经济、哲学、教育等思想作了比较广泛的阐述。如邱树森《从〈郁离子〉看刘基的民本思想》(《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南炳文《刘基的政治思想》(《明清史蠡测》,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吴申元《刘基经济思想浅论》(《浙江学刊》1983年第2期)、胡岩林《从〈郁离子〉看刘基的社会政治思想》(《浙江学刊》1984年第5期)、吕景琳《论刘基的民本思想》(《东岳论丛》1987年6期)等。而前揭周群《刘基评传》则首次对刘基的政治、哲学、教育、军事、文学等思想等进行了全面研究。关于宋濂,代表作当属王春南的《宋濂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是书以评传形式,在辨明宋氏生平著述的基础上,重点揭示了其在政治、理学、文学、书画等方面的思想观点。此外,陈寒鸣《简论宋濂思想的特色》(《孔子研究》1993年第3期)、廖可斌《论宋濂前后期思想的变化及其它》(《中国文学研

究》1995年第3期)等从总体上总结了宋濂思想的特点。陈葛满《宋濂用世思想刍议》(《浙江师大学报》1988年第3期)和《宋濂“养气”说述评》(《高校理论战线》1989年第6期)、唐宇元《宋濂的理学思想》(《孔子研究》1987年第3期)、李道进《宋濂的佛教观》(《浙江学刊》1995年第3期)、张涤云《论宋濂的诗学理论》(《华中师大学报》1997年第5期)、宋开之《宋濂政治教育思想论》(《河海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任宜敏《明代“开国文臣之首”宋濂佛学思想述论》(《浙江学刊》2006年第4期)等,则重点对其政治、理学、文学、教育、宗教等思想进行了专门分析。综上,学界对元明之际士大夫学术思想的研讨虽嫌单调,但既有研究对审视其学术思想的大势颇有裨益。

三、对士大夫与社会政治关系的研究

在这方面,相关研究主要考察了元代士大夫的社会地位、明初对待士大夫的政策两大问题。

1. 元代士人的社会地位。自南宋遗民提出“九儒十丐”一说后,元代儒士社会地位低下的事实俨若定论,前辈学人多以此来衡量元代社会及儒士社会地位。如上世纪30年代,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哈佛燕京学社,1938年)认为儒士在元代地位的卑劣,虽不至于“居于娼之下,丐之上,要亦备受苛虐,而无以异于农民、军、站诸户者也”。此后,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亦说,至元代,“自先秦以来甚占重要位置的士人却骤然失却了他们的地位”。姚从吾在《铁函心史中的南人北人问题》(《食货》1974年复刊第4卷)中,认为“九儒十丐”虽是过激之说,但元代儒士社会地位低下的事实不可否认。陈得芝《从“九儒十丐”看元代儒士的地位》(《光明日报》1986年6月18日)虽然对“九儒十丐”之说提出异议,但也承认元代儒士社会地位低下的事实。邓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在第一章回顾了元代对待儒士政策的变化过程,并以辨证发展的观点审视了儒士的社会地位,指出笼统地说元代儒士受到压迫或受到重用均不符合历史实际。任崇岳《论元代儒士社会地位演变的历史过程》(《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3期)认为儒士在元代经历了由奴役、笼络到摧抑的过程,而这一切又是根据统治者的利益所决定的。乌兰察夫《关于儒家在元代历史地位的探讨》(《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肯定了儒士,尤其是汉族儒士在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进而统一全国中的巨大贡献。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载《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通过梳理元代儒户的设立、义务与权力及出路等,动态考察了儒户社会地位的演进历程及原因。此外,郑克晟《元末的江南士人和社会》(《东南文化》1990年第4期)、许佳君《元代蒙古族儒士大夫的宦途》(《河海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吴彩霞《汉族儒士:元代政治中的边缘人》(《殷都学刊》2001年第4期)、卜照晶《蒙元时期汉族士子在蒙汉文化碰撞与融合过程中的作用》(《内蒙古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等,从社会史、政治史的角度对元代士大夫的生活状态、人生际遇、社会角色、历史作用等作了探讨。

国外,日本学者森田宪司《元代汉人知识人社会的研究》(报告书2002年)使用碑刻资料研究了元朝对汉族士大夫的相关政策。太田弥一郎《元代的儒户和儒籍》(《东北大学东洋史论集》5,1992年)则从制度层面对元代特设的儒户、儒籍的形成、地位及其特点作了探讨。

2. 朱元璋对待士大夫的政策。相关研究大体是围绕朱元璋和明初君主专制加强两大主题展开的。吴晗《朱元璋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的部分章节分析了朱元璋对待士人的政策,尤其对恐怖政治中士大夫的遭遇有翔实的论证。郑克晟《明代政争探源》(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在论述江南地主与朱元璋的关系时,分阶段展现了朱元璋打击江南地主的历史情景,并指出朱元璋打击江南地主的深层原因在于他们对故元的怀恋和对朱明政权的冷漠态度。继之,黄冕堂《朱元璋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和陈梧桐《洪武大帝朱元璋传》(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对相关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如陈书对明初任用贤才、胡蓝党案的论述,在澄清史实方面建树良多。罗东阳《明太祖礼法之治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在论述洪武礼法建设时,剖析了朱元璋大兴文祸、诛夷功臣的外在条件和内在原因。赵骥《宸衷独断——明初皇权政治及其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在阐述胡蓝之狱、特务政治和文字狱等事件时,亦考察了士大夫在此过程中的历史命运。

除专著外,也有一些论文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朱元璋政权对士大夫的政策及与士大夫的关系。最早,陈高华《元末浙东地主与朱元璋》(《新建设》1963年第5期)史论结合,细致分析了浙东地主阶级在元末农民战争中的表现及与朱元璋结合的过程。此后,江涛《在反元斗争中刘基等知识分子和朱元璋的关系》(《杭州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张宁《试论元末儒士在朱元璋统一事业中的作用》(《阜阳师院学报》1985年第1期)、朱正伦《朱元璋政权中的儒生》(《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赵克生《朱元璋战时幕府略论》(《皖西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付明明《明建国前后征聘文士考略》(《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徐永明《婺州文人与朱元璋》(《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第3期)等考察了朱元璋招揽重用士大夫的情形,肯定了士大夫在朱元璋统一事业中的作用。还有学者分析了朱元璋与功臣的关系及杀戮士大夫的状况及原因,如顾颉刚《明代文字狱考略》(《东方杂志》32卷14号1935年)、傅衣凌《关于明初胡蓝之狱的分析》(《厦门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张增江《朱元璋杀戮元勋宿将原因之我见》(《安徽史学》1986年第1期)、何平立《论朱元璋与淮人官僚集团之矛盾》(《安徽史学》1987年第1期)、朱子彦《论明初朱元璋和功臣的关系》(《史学集刊》1994年第2期)、林凤江《朱元璋杀戮功臣元勋另议》(《求是学刊》1995年第4期)、陈高华《沈万三与蓝玉党案》(《明史论丛》1997年)、房锐《明初魏观之狱试探》(《社会科学家》2004年第2期)、张健《朱元璋与淮西集团》(《安徽师大学报》2005年第6期)、吴士勇《诗人高启之死与明初江南文祸》(《史学月刊》2006年2期)等。此外,赵令扬《论明太祖政权下之知识分子》(载《寿罗香林教授论文集》,万有图书公司,1970年)、陈梧桐《朱元璋对人才的使用与摧残》(《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2期)、任崇岳《论朱元璋对待儒士的态度》(《中州学刊》1982年第4期)、王西昆《论朱元璋用人》(《史学月刊》1983年第5期)、杨杭军《朱元璋与明初江南士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等,考察了朱元璋对儒士文人由重用 to 迫害的转变过程及原因。

国外,美国学者罗梅因·泰勒(R. Taylor)《明太祖与勋贵》(《明代研究》1976年2期)分析了朱元璋与勋贵之间的关系变化过程。日本学者檀上宽《明王朝成立期的轨迹——洪武朝的疑狱与京师问题》(《东洋史研究》37卷3号,1978年)在考察洪武疑案与京师问题时,亦对明初士大夫政策和士大夫的遭遇作了描述。福本雅一《朱元璋与文人》(京都国立博物馆《学丛》第27期)通过列举朱元璋对文人的暴虐行为,揭露了洪武专制统治的本质。

四、对士大夫政治动向和生存方式的研究

元明之际,士大夫的政治动向和生存方式发生了一系列突变,因而有关当时士大夫如何在政治和生活上做出抉择,成为学界考察的主题。

在政治动向方面,最早,陈高华《元末农民战争中南方汉族地主的政治动向》(《新建设》1964年第11—12期)在分析元末社会矛盾的基础上,着重考察了南方汉族士大夫在农民战争中的分化和政治动向的变化过程。萧启庆《元明之际士人的多途选择——以各族进士为中心》(《台大历史学报》第32期,2003年)以144名各族进士为例,探讨了士人对元明鼎革的各种反应,并将其所作的政治抉择分为忠元、背元、逸民三类,认为真正影响其间士人政治抉择的因素是“君臣大义”,而非“夷夏之辨”。与此相类,萧氏《元朝科举与江南士大夫之延续》、《元朝南人进士分布与近世区域人才升沉》(均载《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联经出版公司,2008年)两文的部分内容考察了元代进士仕明及元明之间进士分布的延续与变化。桂栖鹏《元代进士在元末农民战争时期的动向》(《浙江师大学报》2000年第6期)指出,元末农民战争时期,虽有少数进士在农民军面前败降奔窜,更有少数进士转入群雄阵营,但忠实维护元王朝的统治是进士群体的基本立场。王军福《述论明初“文人多不仕”现象》(《理论导刊》2007年第9期)分析了洪武时期士大夫不仕明廷的表现及原因。另外,萧启庆《元明之际的蒙古色目遗民》(载《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林红《元遗民诗人的群体文化特征》(《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4期)诸文将遗民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通过解读其诗文蕴意,考察了遗民群体的心理世界、政治取向、精神追求和生活方式。

国外,美国学者约翰·达迪斯(John. Dardess)《儒学和专制主义:职业精英阶层在明王朝建国中的作用》(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对明初“儒家精英”与专制政治的形成和发展作了检讨,客观描述了士大夫(主要指浙东士大夫)在明初专制背景下的政治态度,评估了士大夫在专制构建中的历史作用。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士大夫和民众》(《史林》37-3,1954年)以地域社会史的视角,在相关部分回顾了明初苏松地方士大夫与民众的关系。比利时神甫司律思(Henry. Serruys)《洪武朝中国的蒙古人》(布鲁塞尔,1959年)考究了洪武间诏用蒙古士大夫的史实。韩国学者吴金成《元末动乱期的乡村支配层与武装起义集团》(翰林科学院《历史的再照明》2,1998年)阐述了农民战争期间乡绅在民间社会秩序中的支配地位,及其政治态度的变化和领导武装起义的情形。

在生存方式方面,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交游、遁隐两端。交游是元明之际士大夫生存场景中最为独特且富于生机的画面。对此,萧启庆《元季色目士人的社会网络:以偃百辽逊青年时代为中心》(载《元朝史新论》,允晨文化事业公司,1999年)主要根据在韩国新发现的《近思斋逸稿》,对色目士人偃百辽逊青年时代的社会网络作了详尽考察。刘晓东《明代士人生存状态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的部分章节从治生之道、经济人格、社会交往诸方面描述了明初士大夫的生存状态。尤堪一提的是,雅集作为元明之际士大夫交游的一种特殊方式,更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其间除了彭茵《元末文人雅集论略》(《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属于总体性考察外,多数论者着重考察了玉山草堂的雅集活动,对此谷春侠《元末玉山雅

集研究综述》(《昆明理工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已有专门综述,兹不赘述。

同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遁隐自适之风在元明之际悄然兴起,隐士群体随之形成。由此,“隐士”逐渐进入了学者的研究视野,如美国学者牟复礼(Frederick. Mote)《元代的儒者隐士》(载赖特编《儒士劝教》,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0年)、刘祥光《从徽州文人的隐与仕看元末明初的忠节与隐逸》(《大陆杂志》94卷1期,1997年)、孙小力《论高启的睡欲和诗癖——兼及元代文人的隐乐思潮》(《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王恩俊《隐士与明初政治》(《辽宁师大学报》2004年第1期)、彭茵《元末江南文人避世风尚论略》(《江海学刊》2006年第6期)、许守泯《吴下衣冠尽楚材——元代苏州寓居士人陈基》(《成大历史学报》30期,2006年)等,大体从政治史、社会史角度对隐士群体的生平及政治、社会、文化活动等进行了初步考察。

五、对士大夫的生平和著述的个案研究

在总体和专题研究之时,对士大夫的个案研究也在陆续开展,其中刘基、宋濂、杨维桢、高启等是学界考察的重点,而所论则集中在其生平、著述两个方面。

1. 对刘基的研究。民国时,相继出现了刘耀东《刘文成公年谱》(南田山启后亭铅印本,1939年)和王馨一《刘伯温年谱》(商务印书馆,1939年),二《谱》尽管略显粗糙,疏误亦时有所见,但大致勾勒出刘基生平的轮廓。此后,刘基研究蓬勃发展,有关其生平及著述的钩稽考订取得了重要突破。其中关于生平者有赫兆矩《增订刘伯温年谱》(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和《刘伯温评传》(大连出版社,1994年)。《增订刘伯温年谱》是在王《谱》的基础上增订而成,书中对刘基生平行事作了进一步探索,还对刘基的部分诗文作了系年。《刘伯温评传》则是在《增订刘伯温年谱》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深入而成。此后,刘德隅《明刘伯温公生平事迹拾遗》(台北中华书局,1976年)、留葆祺《刘基散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和杨讷《刘基事迹考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纠正了不少史书记载和前人论述之误。经过学者的探研,刘基生平日渐丰满、完整,为相关研究的拓展奠定了基础。周群《刘基评传》正是在此基础上问世的力作,是书对其生平、著述、诗文创作等皆有深入考究。此外,学界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刘基的事迹及贡献进行了细致探讨,吕立汉《刘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淮北煤炭师院学报》2002年第3期)、田澍《近二十多年来大陆刘基研究综述》(《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已有综述,可资参考。

2. 对宋濂的研究。元明之际,有关宋濂生平事迹的研究,也大体是围绕其学术成就和政治行为而展开的。有人专门考察了宋濂的交游情况,如陈葛满《宋濂交游考》(《浙江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魏青《刘基和宋濂》(《殷都学刊》2000年第4期)和《志趣不同的知己——杨维桢和宋濂》(《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3期)、徐永明《宋濂与戴良友谊变异探微》(《南京师大学报》2007年第2期)。有人探究了宋濂在明初的遭遇和死亡诸事,如辛雨《宋濂的遭遇》(《读书》1980年第1期)、盛翼昌《宋濂之死》(《学术月刊》1989年第11期)、王永湘《宋濂死于何地》(《读书》1983年第8期)诸文。有人考辨了宋濂的著述,如常建华《宋濂佚文(杨氏家乘序)及其价值》(《天津师大学报》2000年1期)、魏青《宋濂〈杜诗举隅序〉一识》(《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4期)、朱仲玉《宋濂和王祿的史学成就》(《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4期)

等。相形之下,陈葛满《宋濂简谱》及《续谱》(《浙江师大学报》1994年第2、5期)旁征博引,在诸多方面纠正了文献之谬误。王春南《宋濂评传》在前五章中全面考察了宋濂在元末明初的生平事迹,尤其是通过对他在明初政治作为的描述,肯定了其历史地位。

3. 对高启的研究。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了高启在明初的悲惨遭遇及死因。既有成果主要有:美国学者牟复礼(F. W. Mote)《诗人高启,1336—1374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2年)、李晓刚《高启的悲剧人生与思想性格》(《重庆师院学报》1998年第4期)、邢丽凤《无用的悲哀:高启论》(《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刘君若《高启死因考辨》(《贵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和《高启生平事迹补正》(《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吴士勇《诗人高启死因探析》(《淮阴师院学报》2005年第5期)、《“魏观案探析”——兼论诗人高启》(《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和《诗人高启之死与明初江南文祸》(《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傅强《高启生平二考》(《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等。

4. 对杨维桢的研究。关于杨维桢的籍贯,学界颇有争论。概括起来,观点有四:一是诸暨人,如章培恒等《中国文学史》、《辞海》等;二是会稽人,如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等;三是绍兴人,如顾希佳选注《西湖竹枝词》等;四是山阴人,如吴晗《两浙藏书家史略》、洪焕椿《浙江方志考》等。鉴于此,有学者专门考证了杨维桢的籍贯,如陈侃章《杨维桢籍贯考》(《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陆林《杨维桢籍贯考》(《辞书研究》2000年第3期)、杨尔《杨维桢籍贯别号考》(《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等,但所持观点仍不出以上四说。孙小力《杨维桢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钩稽沉隐,考察了杨维桢的身世行踪,可谓研究杨维桢生平事迹的奠基之作。此外,么书仪《略论杨维桢多变的生活道路》(《文学遗产》1993年第2期)和张伟《杨维桢生平事迹及学术成就考》(《浙江学刊》2001年第1期)亦对杨维桢的生平事迹及学术成就作了探讨,肯定了其在经学、史学、文学诸领域的重要成就。乔光辉《杨维桢与瞿士衡交游考》(《江海学刊》2001年第5期)、《试论杨维桢的交游与创作》(《盐城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则专门考察了杨维桢在元末的交游情况。

六、研究的不足及新趋势

综上,有关元明之际士大夫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绩,可惜的是既有研究开端虽早,但进展迟缓,迄今缺乏史料扎实、议论深刻的总结性、标志性成果,更未将元明之际士大夫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具体言之,主要表现出如下不足:

其一,对士大夫的研究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一,就个案而言,所论多偏重于以刘基、宋濂、高启、顾瑛、杨维桢等少数社会名流,而对如王冕、李善长、陶安、汪广洋、危素、苏伯衡、丁鹤年、马祖常、李孝光、陶宗仪、杨基、戴良、泰不华、张翥、王逢、陈基、朱升等的研究多停留在简单的生平介绍和现象描述的层面,在研究角度和深度上尚嫌不够。即便是对刘基等名流的研究,亦多侧重于思想方面的考察,不少成果尚属重复研究。二,就群体性研究而言,浙东、吴中学派是研究的重点,而闽中、江西、岭南等士大夫群体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和充分重视。如此,不仅不利于认清元明之际士大夫的概貌,更难全面、客观估量士大夫的历史地位。

其二,纵向动态考察和横向总体相结合的研究成果极少。元明之际,社会格局大体经历了

衰世、乱世、治世三个阶段,随着时势的突变和王朝的更替,士大夫的心态和行为亦不断发生着变化,而这种变化及其表现出的复杂性、多样性,反过来也只有通过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发展的研究视角方能得以揭示。但以往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元末或明初,很少对元明之际士大夫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同时,根据元明之际社会发展特点来分析士大夫所发挥的历史作用的成果尤为缺乏,多数研究仍限于就人论人、就事论事的层面,尚未突出对士大夫与社会政治之间复杂关系的辩证考察,未能将士大夫纳入广泛的历史系统中加以综合研究。

其三,研究视角仍显单一,相关理论方法的运用和创新不够充分。对元明之际士大夫的研究,可以有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心态史、文化史和教育史等研究视角和学术取向。但既有研究在方法和理论运用上尚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是偏重于文化史、思想史,主要表现在对士大夫的文学、思想的研究较多,而政治、社会层面的研究较少;二是部分学者以心态史的角度审视了元明之际士大夫的若干问题,但多停留在对少数重要人物的心理描述上,未从总体上探索士大夫群体的心态特征;三是以政治史的视角进行研究虽起步甚早,但所论大体集中在士大夫在元末的社会地位和明初的遭遇两大问题,且多为重复研究。

其四,相关史料的利用不够宽广和深入。不断发掘和利用相关史料是元明之际士大夫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对过去熟悉的旧史料再作一次新的探索。如《元史》、《明史》等载有大量士大夫的传记,充分利用和阐释这些传记,对于全面认识士大夫的生平和历史作用颇有助益。另一方面,整理与开发新史料,如《明实录》、以《献征录》、《列卿记》等为代表的传记、地方志、文集等,皆是士大夫研究中应充分重视的重要史料。

总之,学界对元明之际士大夫的研究并不成熟,亟待深入和填补的领域尚有不少,诸如士大夫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区域性士人群体的形成,农民战争期间士大夫与各政治势力的关系,士大夫与明初封建政权的重建,等等,皆留有广阔的拓展余地。

《商周金文编:宝鸡出土青铜器铭文集成》出版

霍彦儒和辛怡华主编的《商周金文编——宝鸡出土青铜器铭文集成》在2009年12月由三秦出版社出版,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本书为16开本,共657页,汇集了宝鸡地区2008年底以前出土的存世金文693篇,每篇金文都有青铜器出土背景、拓片、参考资料索引、释文等详细内容;同时,以地域为纲,分为周原(扶风、岐山)、宝鸡市区(金台、渭滨、陈仓)、其他县区(凤翔、眉县、陇县、千阳、麟游)三大部分。选拓精良,体例完善,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完备的宝鸡地区青铜器铭文资料,是一部嘉惠学林的著作。李学勤先生和吴镇烽先生为本书作序。

《商周金文编》的面世,必将对青铜器、古文字以及考古学、先秦史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书灰)